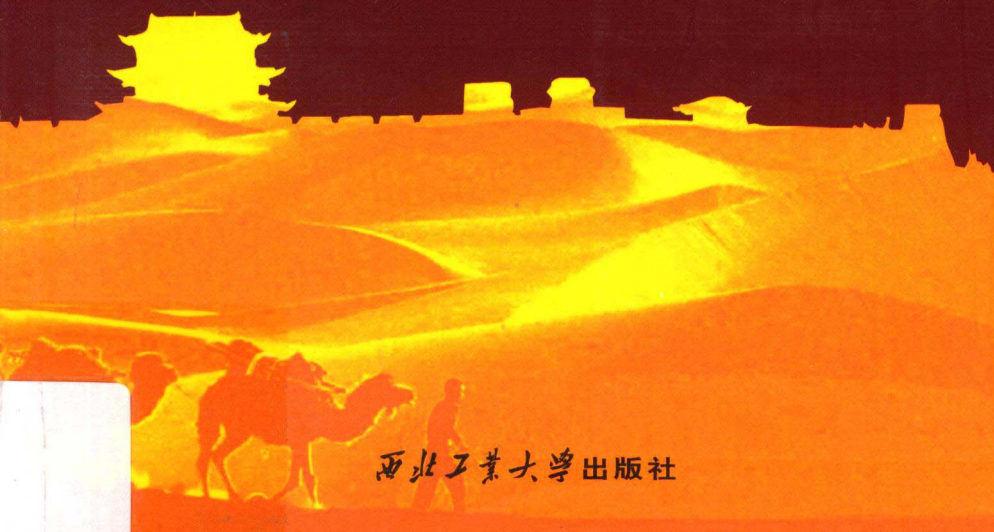


香港孔安道纪念金资助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北部边疆史 若干问题研究

樊明方 著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香港孔安道纪念金资助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北部边疆史 若干问题研究

樊明方 著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第一章首先有力地论证了唐努乌梁海是中国领土,然后论述了19世纪中叶以后俄国侵略唐努乌梁海的情况、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收复该地区及唐努乌梁海最终并入苏联的经过。

第二章详细论述了1911—1921年外蒙古从“独立”到“自治”、取消“自治”、再次独立的复杂过程,以及1921年以后北京政府与苏俄(联)政府就外蒙古问题进行的交涉。

第三章研究了辛亥革命前后中俄两国关于修订1881年《伊犁条约》商务条款的交涉,阐明了这次交涉在历史上的影响。

本书依据大量鲜为人知的可靠历史资料立论,对许多问题发前人所未发,是了解上述三个问题真相的重要参考之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北部边疆史若干问题研究/樊明方著. —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612-3479-2

I. ①中… II. ①樊… III. ①边疆地区—地方史—研究—中国
IV. ①K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3620号

出版发行: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通信地址:西安市友谊西路127号 邮编:710072

电话:(029) 88493844

网址:www.nwpup.com

印刷者:陕西向阳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 mm×1 168 mm 1/32

印张:15.875

字数:421千字

版次: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42.00元

前 言

自从1982年师从李之勤、赵春晨两先生攻读近代中外关系史以来,近代中俄关系和中国北部边疆史便成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到西北工业大学从事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政治学的教学工作。结合本职工作,我对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作了一些研究,同时仍将很多精力用在近代中俄关系史和中国北部边疆史的研究方面,因为这些内容与我担任的教学工作是密切相关的。这部论集是我多年来在中国北部边疆史领域耕耘的部分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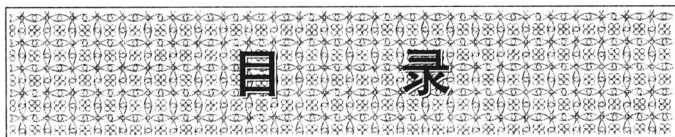
论集收录的论文中,《1921年接运库恰难民回国述略》一文写于2011年1月;其余论文的写作时间,起自1984年,迄于2006年。此次结集,只将个别文字做了订正,内容一仍旧贯,以便留下治学历程的真实记录。论集采取现在这种编排方式,是为了更好地反映出我所研究的不同课题的内在联系。

在2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我得到了许多善良、爱国的人们的无私帮助。以孔宪明先生为主席的香港孔安道纪念金有限公司慷慨解囊,惠赠了这些研究所需的大部分经费。倘若没有该公司的大力资助,我的研究工作不可能取得今天这些成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三次将我的研究课题立为国家项目,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和鼓励。台北“中央研究院”已故研究员李毓澍先生、台北政治大学民族学系教授林恩显先生、台北《中国边政》杂志主编刘学桃先生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热情的鼓励。下列诸人曾对我的研究工作提供过帮助:李之勤老师、周伟洲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吕一燃、马大正、刘存宽、

徐曰彪、陈春华、赵云田诸先生；同窗杨圣敏、厉声、吕卓民；学友毕奥男、房建昌、阿拉腾奥其尔、郭美兰、张久和；同事田建国、万小朋、李辉、郭金香、刘东燕；朋友黄志安。妻子刘梅琴帮助抄写稿件，研究生尹颖尧、任庆银、王楠、简爱、张婧文、赵晓娥、梁艳、毛梦兰、王薇、孟泽锦、王伟、宁欢、尹恒、李小航、袁鸿鹏、李晨、赵鹏、余晓俊、李若雪等帮助校对。谨向上述曾经给予我帮助的人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著 者

2012年2月



第一章 唐努乌梁海问题研究	1
一、1727 年以前中国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统治	1
二、《布连斯奇条约》与唐努乌梁海北境中俄国界的确定.....	17
三、清朝政府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管辖.....	37
四、19 世纪 60 年代中俄西段边界的划定	68
五、19 世纪 60 年代唐努乌梁海西部中俄边界的划定与 阿穆哈河地区割归俄国.....	82
六、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俄国对唐努乌梁海盆地的渗透	103
七、明茨洛夫会见过的三位唐努乌梁海上层人物	135
八、1914 年俄国侵占了唐努乌梁海哪些地方	143
九、《中俄蒙协约》签订后中国收复唐努乌梁海的斗争	146
十、三音诺颜部厄鲁特贝子旗乌梁海事略	176
十一、唐努乌梁海并入苏联始末	186
第二章 外蒙古近代史研究	201
一、中俄乌里雅苏台设领交涉始末	201
二、清末外蒙“新政”述评	212
三、1911 年哲布尊丹巴政权之建立	226
四、海山与 1911 年外蒙古“独立”.....	268
五、1912 年《俄蒙协约》之签订	287
六、1913 年中俄《声明文件》之签订	310

七、《中俄蒙协约》签订后中国政府、中国内地与自治 外蒙古的关系	350
八、1919 年外蒙古取消“自治”述论	363
九、取消“自治”后中国政府对外蒙古地区的治理	392
十、陈毅在外蒙古	405
十一、苏俄军队进占库伦与外蒙古人民党政权的建立	418
十二、1921 年接运库恰难民回国述略	428
十三、北京政府与苏俄代表越飞的交涉——关于外蒙问题.....	443
第三章 1881 年中俄《伊犁条约》的修订问题	456
一、辛亥革命前后中俄关于修订《伊犁条约》的交涉	456
二、1911 年春天之俄牒风波	472
三、中俄《伊犁条约》商务条款后事略述	486
附录 宋教仁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493

第一章

唐努乌梁海问题研究

一、1727年以前中国政府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统治

(一) 清朝以前中国历代政府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管辖

唐努乌梁海自古就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居住地^①。公元前3世纪，中国匈奴族在北方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军事政权，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的结骨部被匈奴征服^②。公元前1世纪中叶，匈奴成为汉朝的臣属。公元2世纪中叶，东汉所属的鲜卑族崛起于辽东

^① 《山海经》里记载了一个“巫咸国”；并记载了“大咸之山、小咸之山、少咸之山”等山名。潘世宪先生认为：《元史》中谦河（即叶尼塞河）的“谦”“其声近咸”，现今的“贝克穆河”“华克穆河”可以看作古代的大咸河与小咸河，克穆齐克河可以看作少咸河；东西萨彦岭可以看作古代的“大咸之山”与“小咸之山”，唐努山可看作“少咸之山”。唐努乌梁海地区就是古“巫咸国”的所在，这个地区远古时期就与中原地区有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见潘世宪：《唐努乌梁海与中原地区的关系》，载于《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4期。此说作为一家之言可供参考。

^② 结骨即黠戛斯，也称坚昆，元代称吉利吉思，今称柯尔克孜，俄国称吉尔吉斯。

塞外，“尽据匈奴故地^①。”三国时，鲜卑首领轲比能被曹魏封为附义王。公元5世纪初，北魏所属的柔然部取代鲜卑。公元6世纪中叶，原居于叶尼塞河上游及阿尔泰山一带的突厥部^②推翻柔然政权，统治了漠北。630年，东突厥被唐朝灭亡，漠北为突厥属部薛延陀所割据。

此时，都播（或作都波，元代称秃八或秃巴思，清代称唐努乌梁海，即今图瓦）人居住在唐努乌梁海地区。都播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最早在《北史》和《隋书》中提到^③。唐朝初年，都播作为木马突厥三部落之一，是位于萨彦岭以北的结骨部的属部^④。薛延陀崛起之后，都播与结骨一起，处于薛延陀的控制之下。646年，唐军击破薛延陀，铁勒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等11部酋长都请求服属唐朝，表示“愿得天至尊（唐太宗）”做他们的可汗，并要求于其地“置汉官司”，即设置唐朝的政权机构^⑤。647年初，唐政府宣布在大漠以北铁勒居地设置6都督府、7州。647—648年，骨利干、都播、结骨等部相继遣使入贡，“请置唐官^⑥”。唐于骨利干部置玄阙州（后改余吾州），于结骨部置坚昆都督府。都播是结骨的属部，唐努乌梁海自然属于坚昆都督府管辖。坚昆都督隶属于燕然都护（燕然都护府后改为瀚海都护府，又改为安北都护府），唐努乌梁海从此归入唐朝版图。

都播人朝见唐朝皇帝，史有确证。俄国人拉得洛夫著有《蒙古的古突厥文碑铭》，其第317页收录的唐努乌梁海白葛勒地区突厥文墓碑第一行说：“在我25岁时，我朝见唐朝天子，受赐金银”。都播贵族还接受唐朝的官职和尊号，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突厥文墓碑

① 《后汉书》，第90卷，《鲜卑传》。

② 《周书》，第50卷，《突厥传》。

③ 《北史》第99卷，《铁勒传》；《隋书》，第84卷，《铁勒传》。

④ 关于都播与结骨的关系，参看《新唐书》，第217卷，《回鹘传》。

⑤ 《太平寰宇记》，第198卷，《铁勒》；《唐会要》，第96卷，《铁勒》。

⑥ 《新唐书》，第217卷，《回鹘传》。

中可见到以下几种：都督、职使（刺史）、长史、将军、公主。都播贵族称他们的妻子为“公主”，而且还几乎都称为“闺中的公主”。都播地区出土的 20 多通墓碑中，差不多一半有与“公主”或“闺中的公主”永别的话，可见这个汉族皇帝女儿的尊号，都播贵族是非常喜爱的^①。

唐朝时期，中国内地人民对祖国的领土唐努乌梁海已有相当的了解。关于都播地区的民情风俗，《通典》有如下记载：“结草为庐，无牛羊，不知耕稼。土多百合草，取其根以为粮，兼捕鱼射猎为食，而衣貂、鹿之皮，贫者缉鸟羽以为服。婚姻，富者以马，贫用鹿皮及草根为聘礼。死亡以木柜盛尸，置山中，或悬于树上，送葬哭泣略与突厥类。莫知四时之候^②”。都播境内山多雪厚，冬月狩猎都使用木马。《新唐书》记载说：都播人“俗乘木马驰冰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辄百步，势迅激^③”。狩猎民族的这种传统的生产工具，在这个四面环山的地区，沿用了很久。

武则天时期以后，都播与漠北铁勒诸部为后突厥汗国所征服和统治。745 年，回纥部在唐朝支持下率铁勒诸部消灭后突厥汗国，建立回纥汗国。9 世纪中，黠戛斯大破回纥，称雄于漠北，唐努乌梁海成为黠戛斯属地。

唐朝灭亡后，唐努乌梁海地区先后处于辽、金统治之下。辽代，住在今叶尼塞河流域的辖戛斯（即黠戛斯）是辽的属国。1959 年，苏联考古工作者在唐努乌梁海发掘出 120 座中国建筑物。据《苏联考古》杂志报道，这些建筑物的屋顶，“盖的是中国型的焙烧得很精致的琉璃瓦……屋脊和屋角有富丽堂皇的大量雕塑品：有张口卷身的巨龙、美丽动人的凤凰”等。在这些建筑物中还发现“中国的上釉器皿、磨盘……以及中国型铜钱。这些钱币都是同一时期

① 韩儒林：《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出版，第 326 页。

② 杜佑：《通典》，第 199 卷，《边防》十五。

③ 《新唐书》，第 217 卷，《回鹘传》下。

的，写着“大金通宝”^①。这说明了当时唐努乌梁海与中国内地经济文化联系的深度和广度。

1206年，蒙古族首领铁木真统一了蒙古草原，自称成吉思汗。次年，他命长子拙赤北征“森林百姓^②”。拙赤降服了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主要居民秃巴思（即都播）人以及居住海境的斡亦剌、撼合纳等部，取得了整个唐努乌梁海的土地^③。当时斡亦剌人居于华克穆河上游，撼合纳人在贝克穆河流域，其余地区为秃巴思人居住。成吉思汗将收服的斡亦剌各部并成4个千户，交由该部的一个率先归降的首领忽都合管辖，秃巴思人的住地则归成吉思汗直辖，这些地区以后成为元朝岭北行省的组成部分。

唐努乌梁海克穆齐克河流域在元朝称为谦州。《元史》记载说，“谦州，亦以河为名，……在吉利吉思东南，谦河西南，唐麓岭之北^④”。吉利吉思的中心在叶尼塞河与阿巴坎河一带，谦河指乌鲁克穆河（叶尼塞河在唐努乌梁海境内自贝克穆河与华克穆河汇合处往下的一段）及其以下的叶尼塞河干流，唐麓岭即今唐努山。“吉利吉思东南，谦河西南，唐麓岭之北”，正好是克穆齐克河流域。

成吉思汗占领谦州之后，这里成为屯兵重地和手工业中心。成吉思汗利用谦州“出良铁”和盛产毛皮的条件，将从金朝俘虏来的成千工匠迁到这里，设置若干工匠局，专门制造武器、甲冑^⑤。冀州人贾塔刺浑率领的炮手军曾在谦州驻扎过，后来在西征中亚时起

① 克兹拉索夫：《图瓦与中世纪城市》，载《苏联考古》，1959年，第3期，第75~76页。转引自马曼丽：《从乌梁海问题看沙俄对中国的侵略》，载《中俄关系史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385~386页。

② 当时蒙古草原以北，从贝加尔湖到额尔齐斯河流域，分布着许多说蒙古语或突厥语的部落，因为他们的住地山岳连绵，森林密布，所以草原上的蒙古牧民称他们为“森林百姓”，也作“林木中百姓”。

③ 道润梯步著：《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269~270页。

④ 《元史》，第63卷，《地理志》六。

⑤ 《元史》，第63卷，《地理志》六；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下卷。

过一定作用^①。汉族工匠还在这里“织绫罗锦绮”。谦州“地沃衍宜稼，夏种秋成，不烦耘耔”，是漠北少有的粮食产地^②。

1260年，忽必烈做了蒙古大汗。当时窝阔台后王海都与忽必烈矛盾尖锐，谦州以西地区归海都管辖。出于与海都作斗争的需要，忽必烈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着意经营。在他即位之初，就派名将脱伦阁里必之子伯八为驻守谦州万户^③。1270年，即忽必烈正式改国号为大元的前一年，他派遣汴梁祥符（今河南开封市）人刘好礼到唐努乌梁海地区，担任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乌斯、昂可刺等“五部断事官”，“以比古之都护，治益兰^④”。“根据考古发现，断事官的治所，也就是所谓的‘大营盘’，在今日乌鲁克穆河左岸之厄列格斯河（埃列格斯河——引者注）下游。^⑤”经过各族人民多年的建设，益兰州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城镇。刘好礼到任后，在此修建了宫廨、仓库，设置了招待过往官员的传舍。元朝政府还设立“欠州武器局”，负责制造、修理和管理军事装备。“欠州武器局，秩从五品。大使、副使各一员。”元朝政府并且派遣军队在谦州屯田^⑥。

元朝政府还在谦州征收赋税。谦州盛产岩盐和池盐，不用人力加工，天然生成，“调味甚适口。”当时谦州的“大营盘处亦以此为课程抽分”，此种税收在刘好礼任断事官时曾一度蠲免。我国江南地区人民多食海盐。从谦州南归的人，往往把这种“或方而坚、或碎而松、或大块可旋成盘”的谦州食盐携回，分赠亲友^⑦。

① 《元史》，第151卷，《贾塔刺浑传》。

② 《元史》，第63卷，《地理志》六；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下卷。

③ 《元史》，第193卷，《伯八传》。

④ 《元史》，第63卷，《地理志》六；第167卷，《刘好礼传》；第128卷，《土土哈传》。

⑤ 韩儒林：《穹庐集》，第354页。

⑥ 《元史》，第90卷，《百官志》；第11卷，《世祖纪》，至元十八年闰八月；第12卷，至元十九年十一月。

⑦ 杨瑀：《山居新话》；《元史》，第167卷，《刘好礼传》。

刘好礼为发展谦州经济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当地居民原来习惯于用杞柳树做杯皿，用“剝木为槽”的独木舟渡河，也不会铸造农具。刘好礼将这些情况报告元朝政府，元政府就派内地工匠来传授制陶、造船、打制农具的技术，这对当地生产技术的提高起了促进作用^①。当地少数民族人民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元朝政府向他们传授播种小麦和修筑运河技术知识的故事，几百年后仍在当地流传^②。元朝政府还常向唐努乌梁海地区调拨钱钞、粮食、衣裘，供应农具和渔具。虽然这些钱物只向屯田军、官匠户、站户等发放^③，但对当地生产的发展不无裨益。

元朝的大统一加强了国内各民族间的交往。唐努乌梁海成为秃巴思族、蒙古族、汉族等几个民族杂居之区。《元史》说：“谦州，……居民数千家，悉蒙古、回纥人。有工匠数局，盖国初所徙汉人也^④”。当时把秃巴思等泛称为回纥，加上蒙古和汉人，很准确地反映了当时谦州存在的三大民族成分。

谦州等地的居民，由于各种原因被成批迁往内地。如1265年和1270年，忽必烈政权先后迁谦州诸色匠户和甲匠到中都和松山^⑤。

拉施德《史集》记载，谦州“有很多城市和村落^⑥”。据考古发现，益兰州、埃列格斯河以东的拜哈克附近、乌鲁克穆河南岸沃马克地方都有元代城镇遗迹，这三城出土文物的风格和取材都同中

① 《元史》第167卷，《刘好礼传》；第63卷，《地理志》六。

② Carruthers, D: Unknow Mongolia; a record of travel and exploration in North-West Mongolia and Dzungaria. VoL. I, London, 1914. (卡拉瑟斯：《神秘的蒙古》，第1卷，1914年伦敦出版)，第204页。

③ 《元史》，第6卷，《世祖纪》，至元六年二月；第11卷，至元十八年六月，闰八月；第12卷，至元十九年十一月。

④ 《元史》，第63卷，《地理志》六。

⑤ 《元史》，第6卷，《世祖纪》，至元二年春正月；第7卷，至元七年六月。

⑥ (波斯)拉施德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第1卷，第1分册，第246页。

国内地一样^①。1949年，在乌鲁克穆河以北的图兰城发现了元代的铁犁，犁的拨土板上铸有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的记号^②。它同唐努乌梁海地区已经发现的其他文物和遗迹一起，是历史上元朝曾在这里实行有效管辖的见证。

元明之际，唐努乌梁海由蒙古瓦剌部控制。明代中期，蒙古达延汗击溃瓦剌部，将唐努乌梁海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二）唐努乌梁海归附清朝

明末清初，唐努乌梁海属于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部和托辉特首领管辖。“和托辉特为喀尔喀极边，西近厄鲁特，北近俄罗斯，俗喜斗，乌梁海复错处其间，捕貂射猎，依木而居，纳赋和托辉特，有事则藉之为兵^③”。苏联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一书多处讲到和托辉特首领对唐努乌梁海一带的管辖，书中说：1609年以后的几年里，“托木斯克将军衙门的管辖范围已大大扩展，但将叶尼塞河流域及其南面的一些支流流域确属俄国所有这一工作进展很慢，因为这些地区实际上处于硕垒阿勒坦汗统治之下。‘在上述范围（指叶尼塞河、额尔齐斯河、鄂毕河的上游地带——引者注）内，俄罗斯人经常要和蒙古人及卡尔梅克人打仗……要和阿勒坦汗，有时还要和卡尔梅克的洪台吉平分征收毛皮实物税的权利’。^④”

① 吉谢列夫：《古代蒙古的城市》，莫斯科，1965年出版，第59～119页。转引自周清澍：《元朝对唐努乌梁海及其周围地区的统治》，载《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78年第3期。

② 列文等编：《西伯利亚各民族》，莫斯科，1956年出版，第420～430页，《图瓦人》。转引自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11辑，第27页。

③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63卷，《扎萨克多罗贝勒根敦列传》。

④ （苏）沙斯季娜著，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译：《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商务印书馆，1977年出版，第15页。按：俄国人将中国喀尔喀蒙古和托辉特部首领硕垒乌巴什及其继承者称作“阿勒坦汗”（意为“黄金汗”），其实，他们只是喀尔喀扎萨克图汗的部属，并无汗号，只称“珲台吉”。

据沙斯季娜这本文书记载，1631年后半年，俄国托木斯克将军塔捷夫的使者卡里亚金“到达了克姆契克河（即克穆齐克河——引者注），当时那里是阿勒坦汗的主帐所在地^①。”

1652年，和托辉特首领俄木布额尔德尼率军4000名越过萨彦岭，进入吉尔吉斯人游牧区。俄国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将军派遣属员科洛夫斯基前去阻拦。“由于谈判和科洛夫斯基要求的结果，阿勒坦汗被迫撤到萨彦岭后面^②。”可见萨彦岭后面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当时是为俄国所承认的和托辉特首领的辖地。

5年以后的1657年，俄木布额尔德尼的儿子罗卜藏台吉额琳沁率军7000名到距离克拉斯诺雅尔斯克5日路程的叶尔巴河畔扎营。俄国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将军派遣50人长科利佐夫去见罗卜藏台吉，要求他离开此地。“罗卜藏回答说，他现在就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这哪里是你们君主的土地，这块土地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③”这里和托辉特首领认为唐努乌梁海以北地方自古就是自己的属地，唐努乌梁海自然更不待言。

1662年，罗卜藏台吉额琳沁因干涉扎萨克图汗的王位继承问题与土谢图汗等王公发生战争，罗卜藏被打败，他“便退到自己的游牧区……在叶尼塞山区游牧。”俄国托木斯克当局派出拉弗罗夫使团前来访问。罗卜藏驻扎在克穆齐克河畔，拉弗罗夫在那里找到了他。^④从上述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17世纪中叶，唐努乌梁海地区不但在喀尔喀和托辉特部的管辖之下，且常常是该部首领的驻地。

唐努乌梁海服属于和托辉特，和托辉特则服属于清。和托辉特

① 沙斯季娜著，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译：《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30页。

② 沙斯季娜著，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译：《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76~77页。

③ 沙斯季娜著，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译：《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78页。

④ 沙斯季娜著，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译：《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83~85页。

首领与喀尔喀扎萨克图汗格垓克延丕勒同族。明朝末年，和托辉特首领硕垒乌巴什建立了巩固的封建领地，“虽隶扎萨克图汗，实自为一部。^①”从1638年起，喀尔喀车臣汗、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每年向清“贡白驼一，白马八，谓之九白之贡。”^②1655年（顺治十二年）冬，清朝封喀尔喀八大封建主为扎萨克，此时硕垒乌巴什已经去世，他的长子俄木布额尔德尼被封为八扎萨克之一。俄木布额尔德尼死后，其子罗卜藏台吉额琳沁继位。此人曾两次作乱于扎萨克图汗部，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被扎萨克图汗成衮及其子沙喇俘获，后逃至准噶尔和西藏。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喀尔喀各部封建主会盟于土谢图汗部库伦伯勒齐尔，清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等奉命赴会调停各部封建主之间的纠纷。清政府在会盟期间又封一些人为扎萨克。鉴于和托辉特部自罗卜藏台吉额琳沁西奔之后久已无人主政，阿喇尼奉命授根敦为扎萨克，“领和托辉特众”。根敦是俄木布额尔德尼弟弟杭图岱之子、罗卜藏台吉额琳沁的堂兄弟。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以后的几年间，喀尔喀各部在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的军队的打击下大举南迁，只有根敦率部在漠北色楞格河、杭爱山、阿尔泰山等地与噶尔丹军周旋，屡建战功。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根敦遵照康熙帝命令率部南下，清朝封他为多罗贝勒，仍兼扎萨克。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根敦率部参战，被奖赐冠服。他于次年去世，长子松津僧格降袭扎萨克辅国公。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松津僧格卒。因松津僧格无子，根敦嗣子博贝降袭扎萨克一等台吉，管理旗务。次年清廷改封博贝为扎萨克辅国公。^③

由于1655年以后和托辉特部成为清朝的属部，和托辉特管辖

①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63卷，《扎萨克多罗贝勒根敦列传》。

②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第3卷。

③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63卷，《扎萨克多罗贝勒根敦列传》；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第3卷，《外蒙古喀尔喀部要略一》；张穆：《蒙古游牧记》，第10卷。

下的唐努乌梁海当然也就成为清朝的一部分了。

然而，在17世纪末以前的几十年里，清朝通过喀尔喀和托辉特部对唐努乌梁海实行的统治很不稳定。当时唐努乌梁海西南面的科布多、乌兰固木一带为厄鲁特、喀尔喀“混杂驻牧”之地^①，西面和西北面为准噶尔辖区。准噶尔与和托辉特部时常发生武装冲突，和托辉特部时胜时败，唐努乌梁海附近地区有时被准噶尔势力占据^②。在此情况下，和托辉特首领对唐努乌梁海的管辖自难严密。1688年以后的几年间，准噶尔首领噶尔丹占领了喀尔喀大部分地区，和托辉特首领更难对唐努乌梁海实行有效的控制了。

17世纪初，俄国势力扩张到叶尼塞河中下游。从此时起，包括唐努乌梁海在内的中国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和托辉特的领地进入了俄国扩张主义者的眼帘，成为他们侵略的目标。17世纪初至70年代，俄国曾进行过一系列阴谋活动，企图将包括唐努乌梁海在内的中国喀尔喀和托辉特部领地攫为己有。

1616年，俄国托博尔斯克将军库拉金派遣丘麦涅茨等人来到和托辉特首领硕垒乌巴什的驻地，劝说他“臣服沙皇”，硕垒乌巴什“认为没有宣誓效忠沙皇的必要，他只力求同强大邻国建立友好关系。”因此，他“用喀尔喀西部全权主人的态度、以对等的身份”接待了丘麦涅茨使团。^③此后俄国又曾几次劝诱硕垒乌巴什归附俄国，均被拒绝。硕垒乌巴什于17世纪20年代末死去。1634年，俄国政府派遣图哈切夫斯基使团来到硕垒乌巴什的继承人俄木布额尔德尼的住地，劝诱俄木布额尔德尼向俄国沙皇宣誓效忠。俄木布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第15卷，第19～21页；《清世宗实录》，第31卷，第11～13页。

② 沙斯季娜著，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译：《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92～94页；（苏）兹拉特金著：《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马曼丽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第241～246页。

③ 沙斯季娜著，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译：《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18～21页。